

【学术讲座】

新疆人口转变与人口发展

——回应西方学者关于新疆问题的观点

李建新

（2020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教授在北京大学理科五号楼做了题为《新疆人口转变与人口发展》主题讲演，本文根据讲演主要内容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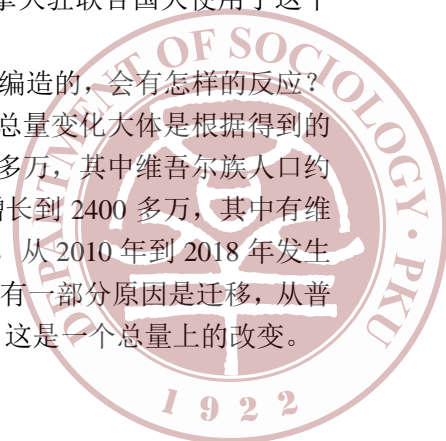
现今最大的事件是疫情，但是疫情期间有很多中美摩擦，其中新疆问题不断上头条，我们引出两条。第一条是9月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西方媒体污蔑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推行强制绝育这一事提问。发言人华春莹做了如下回应，她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78年500多万，在40年间增长到1272万，是过去的两倍多。给出这一系列的数据后，这件事就明白了。第二条是这周日的新闻，这次不是记者提问，而是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就同一问题发问，发言人赵立坚使用了刚才我们公布这个数据作出回应。

问题的源头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一数据，我先解释分析一下这个数据。通常说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但主要人口是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这四个民族人口数量是百万级别，合计占比新疆人口的90%以上。可以看到外交部发言人是按照官方统计年鉴数据作出回应的。维吾尔族在新疆地区人口增长最快。即使在全国56个民族中，维吾尔族人口增速也是最快的之一。

面对这个事实，为什么会有不断的质疑发难？他们的观点其实来自于德国学者阿德里安·曾兹的调查报告。他的中文名字叫郑国恩，号称是西藏新疆问题专家，他在2020年6月做的报告。简称为《新疆强制节育报告》。在报告中，他承认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发展快。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口四十年翻了一倍，但是他聚焦在这几年。南疆地区少数民族和田市于田县，13-16年的自然增长率高达千分之20，这是较高的增长率。2017年数据为千分之10，下降了千分之10个点，但仍然是较高水平。问题是在2018这一年其人口增长数据由正转负，而且正转负不是渐进的，是突然转变。所以问题是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郑国恩认为新疆在这一年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实施节育和绝育。节育最常用手段是女性上环，绝育是结扎。他收集了南疆地区出台的各项政策，比如说这几年出台的免费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政策、上环绝育奖励政策。如果你孩子生够了，选择采取避孕措施会获得一定奖励。他收集不少这样的资料数据，他的结论是：通过在维吾尔族人口中推行强制绝育计划，是否是一种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这个报告出台后，在第一个新闻中，华春莹回应记者时记者使用的用词是“在新疆推行强制节育和绝育政策”，在第二个新闻中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使用了这个“种族灭绝”。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们看到他拿出这样的统计事实，不是胡乱编造的，会有怎样的反应？我的观点：他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我先介绍新疆基本的人口情况。总量变化大体是根据得到的普查数据，我们还是用2010年的普查数据。当时新疆人口是2100多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约1000万、汉族人口有800多万，到2018年的时候，新疆人口已经增长到2400多万，其中有维吾尔族人口1200多万、汉族人口700多万。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发生两个大的变化——维吾尔族人口迅速增长和汉族人口出现回落。回落有一部分原因是迁移，从普查时期到现在，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人口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总量上的改变。



我们从结构来分析。从1990年到2010年，四个人口居多民族的年龄结构变化特点是：汉族人口呈现老化趋势；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相对年轻；回族介于中间。2010年我们发现这个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此外性别比变化可以发现，汉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但少数民族差不多正常。

看社会经济结构，教育水平总体在不断提高，但是不同民族间存在差距，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相对来说教育水平低一些。看行业和职业构成。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这些年调查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汉族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维吾尔族农民的职业比重比较高，汉族在党政机关商业服务比例较大，这是构成的差异。另一个宗教结构。新疆人口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另一部分是信仰泛儒教的汉族等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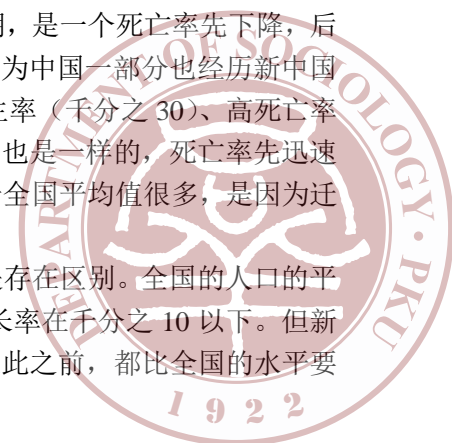
另一个结构是新疆人口的地理分布。新疆总体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几个民族之间可发现一个特点——汉族的城镇化水平比较高，而其他少数民族较低。另一个是地域分布——汉族人口分布比较分散，而少数民族相对集中。乌鲁木齐人口密度最高、伊宁是相对高的、接下来是喀什传统的居住地。南疆主要是维吾尔族，汉族相对来说更加散居。最不均匀的是塔吉克族，塔吉克族基本上就居住在喀什的民族自治县，其他民族大致是这个分布特点。

人口理论描述了人口的三个变化特点：第一，人口由高位静止状态转变为低位静止状态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嵌入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是发展式的变化。第二，它是有序次性的、不可逆过程。正常的人口演变一定会表现出序次性，死亡率先下降，然后生育率再下降。同时，不可逆性是说如果一个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那么就无法再回到高出生、高死亡状态。第三，人口转变是一个分阶段变化的过程，不同的学者给了不同的阶段划分方法，保持了几个特点，遵循有序性：死亡率先下降，生育率基本不变。然后死亡率达到低水平，保持稳定，生育率随之下降，走向新的阶段。

了解到变化过程的特点后，便需要对这种过程进行解释，探索解释性理论。解释性理论也有不同的流派解释，但是将这些流派的解释汇总之后，大家的共识在这四大因素上：第一，人口因素，出生和死亡之间，是存在关联的。高死亡率一定会导致高出生率，因为人类要延续。但是低死亡率不一定会导致低生育率。一定是死亡率先下降，这也表现了序次性。第二，社会经济因素，例如教育、健康、城市化等等。其中教育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比如教育可以直接影响生育。生育的承担者是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人口，女性人口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具备生育的生理能力。但是教育普及之后，会延迟女性结婚生育的时间，同时改变生育观念。第三，法制法规政策，尤其对于我国影响较大。比如婚姻法，生育是在建立婚姻的家庭关系之后完成的，再比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第四，文化观念，即价值观。比如说汉族人口中存在传宗接代的多子观念，伊斯兰教中也存在这种多子观念。

在这样的框架下讨论新疆的人口变化特点，可以发现也遵循相同的规律。全国的人口转变如忽略三年灾害时期，是一个相对均匀的变化，是比较典型的人口转变。中国人口转变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它的起点是高出生率（35%）、高死亡率（20%以上），是一个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其中死亡率先下降。忽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一个死亡率先下降，后稳定，然后出生率下降的过程，这符合人口转变过程的规律。新疆作为中国一部分也经历新中国以后和平发展过程，开始走上现代化。同样，对于新疆，先是高出生率（千分之30）、高死亡率（千分之20），这就是高出生高死亡。如果我们忽略两个峰值，趋势也是一样的，死亡率先迅速下降，然后一直稳定。生育率亦然。而在这些年有特殊最高峰，高于全国平均值很多，是因为迁移人口。然后之后迅速下降。

但对于纵坐标分析，新疆人口和全国人口相比，两条线水平还是存在区别。全国的人口的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进入了低增长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10以下。但新疆人口只在2018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全国接近，在此之前，都比全国的水平要



高。所以得出结论，新疆整体的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更慢。按照人口转变的标准便可以解释。边疆地区发展各项指标相对落后，因而人口转变速率更慢。

数据表明，从 1998 年开始，北疆和东疆已经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三低阶段，但在生育水平上略有差异。南疆则仍处于较高的生育水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两个奇异点数据，第一个点，2014 年南疆的出生率陡增，如喀什地区人口出生率更是达到 60‰。按人口学的知识，大部分阶段人类没有突破 40‰的出生率和 35‰的死亡率，60‰的出生率很有可能是一个错误数据。通过我们进一步与相关单位的数据核查，了解到实际情况是，2014 年出生率奇高，是因为那几年，由于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许多地区的人口生育处于完全自由放任状态，存在着较大范围的瞒报漏报，后来“访惠聚”工作组下乡纠偏核查，这一现象才得以遏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补报，而补报的数据都统计在了 2014 年，于是使得 2014 年出生率陡增。第二个点，2017 年出生率也出现小的陡增，这一次数据异常的原因与 2014 年大体相同，这是在 2014 年基础之上的彻底数据清查。

这两个特殊的数据反映出宗教文化观念因素对民族人口变化差异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再通过对政策差异的梳理来了解研究民族人口转变的差异，如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权力下放到自治区，使得对于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开展较晚且相对宽松。90 年代，针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但地方的贯彻执行力度不佳，后通过反复修改，最终在 2017 年修改后的条例中删除了对于民族间的差别对待。自此，新疆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再以民族作为区分标准，转而以城市与农村人口作为区分标准。于是在 2017 年后，少数民族人口生育率有明显的下降，不过，虽然民汉死亡率都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但是汉族出生率相对于少数民族仍较低，存在着差距。

这些变化数据本身反映出新疆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我们将其定义为边疆地区发展中的问题。对新疆而言，有几种关系最为重要，其中首先是“稳定与发展”。新疆最早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与发展的需求产生矛盾。这一矛盾与民族关系矛盾都是无法回避的。南疆至今仍然面临着人口增速快、生态环境压力大、贫困问题、医疗卫生、教育就业、城镇化、地区差异等发展问题，这些都反映出新疆发展问题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表现为多种问题同时存在、多重叠加。新疆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人口差异，也存在着南疆和北疆、城市和农村的地域差异等，这些差异的叠加造成问题的多重性质。这些问题的性质，一部分是发展问题，一部分是稳定问题，这种异质性使得新疆问题更加复杂。

新疆新的发展机遇可以以几个大事件作为标志。第一是 2010 年以后的大规模援疆，虽然援疆一直进行，但 2010 年后规模与力度都大幅增加；第二是 2013 年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构想战略发布后，新疆的发展有全新的定位；第三是 2014 年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今年的第三次新疆工作会议也给新疆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促进了新疆的发展。

新疆近年来人均 GDP 的变化是显著的，而新疆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更为突出，例如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医疗等。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在人口学概念上，也可视为人口发展的一部分。人口发展的概念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上，其中的质量就是以健康和教育为衡量标准的。新疆的人口发展体现在新疆在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发展。新疆从 2013 年开始就加大了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南疆部分地区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达到了 99% 的高中升学率，这一成果是国家加大投入的结果。新疆在医疗方面这几年也加大了投入改善。在 2013 年，新疆的医疗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较大，但在 2019 年时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因而在总体上，新疆的教育与健康的发展非常迅速。

在国家政策的带领下，新疆许多指标良好发展，基层农村各类指标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值，体现了基层的迅速发展。再以喀什地区发展为例，喀什作为南疆的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在 2010 年后，中央出台政策加大了对喀什的对口支援，山东、上海、广东、深圳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援疆范围深入到偏远乡村。喀什本地的建设重点是老城改造，在如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成果。从这些数据看援疆的成就表现在了喀什经济发展、基本建设、教育医疗的方方面面。国

家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和新疆全方位的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在座的来自新疆的各位同学都能真实感到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在新疆的落地结果。

有了上面的认识基础，了解了全面真实的新疆，尤其是近五年发生的变化，我们再回到讲座开头提出的问题。

回应这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之前，我们先普及一点人口学的统计知识。在郑国恩的指标里出现了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率（RNI）等于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出生率（CBR）是某一年的出生人口除以该年的平均人口数，死亡率（CDR）是死亡人数除以人口数。这是我们常用的描述人口转变的数据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叫总和生育率（TFR），它是年龄别生育率之和。总和生育率与自然增长率、出生率都有相关关系，受到人口中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的影响，这其实是一个结构模式指标。

观察郑国恩给出的数据。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人口指标会在 2018 年发生突变？郑国恩给出的解释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所导致。我们先把上述新疆人口问题抽象成一个一般化的人口原理。人口的生育水平并不是简单地由出生率计算，而是通过考察育龄妇女生育方式得来的。它本身具有一种模式，即在某个年龄以某种强度去生育，最后会得到某个总量。我们先看一组和田县的普查数据，可以计算出育龄妇女的年龄生育率实际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然后使用实际统计数据构造新的数据。按照 2015 年的数据，此模式的总和生育率为 2.4。假设五年之后其生育模式不变、生育水平变，生育率会降至 0.8。如果单使用汉族的生育模式构造，虽然生育水平同为 0.8，但是年龄别生育率结构不同。

从 2.4 到 0.8，什么条件下总和生育率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新疆人口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可具体体现在教育上。以南疆为例，过去女性 15 岁接受完初中教育后毕业，毕业后即结婚生育。如 2014 年我在南疆某地调查时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位 1972 年出生的维吾尔族女性，在 1990 年结婚并生子，生了 4 个孩子；1990 年出生的孩子，2008 十八岁结婚，到 2014 年六年过去，又生育了四个孩子。我们会发现 90 后的青年和 70 后的妈妈，她们的生育模式几乎是一样的。近年来，南疆女性教育水平的提升，所有 15 岁初中毕业后女生的婚育年龄都因为普及高中教育而推后；另一方面，高中教育直接改变了她们的婚育观，所以和过去相比，15-19 岁年龄别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意味着早婚早育的情况基本没有了。

第二个解释，生育率如此迅速下降还因为各项政策法规的落实。2014 年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提出“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这三项举措。落实依法治疆首先体现在落实婚姻法。过去在南疆，由于受宗教因素影响，婚姻是由宗教仪式来确认。现在婚姻确立的前提是纠正违法婚育，落实婚姻法规。同样计划生育政策从 2017 年开始全体公民一致化，没有落实的将会得到落实。上面举的那位 90 后母亲的例子，到 2015 年 25 岁，虽然是育龄妇女，但按政策已经没有生育指标。对待这些人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教育？按照政策，你该上环的上环，该结扎的进行结扎。这里面也许有强迫的案例，但是我们调查到更多的是宣传奖励为主，政策会免费提供各项服务，有各种奖励措施。所以符合政策法规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骤减，因为她们都已经“透支”了她们的生育，因此人口出生率的突然下降也是依法治疆、政策法规落实的结果。

第三个解释，宗教传统观念的影响减弱，世俗化趋势加强。过去一段时间在新疆南疆地区宗教的因素影响女性婚育观念和和行为，现在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宣传，遏制住宗教极端思想影响，所以人们的婚育观也同样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生育模式的转变是发展的结果，具体体现在教育、健康卫生、依法治疆、宗教观念淡化等方面。这种发展是符合人口转变规律的，是在以上发展因素影响下由一个传统的早婚早育密育多育模式转向一个现代的遵循法律法规正常生育模式的结果。

人口生育模式急剧转变后，相对应的统计数据指标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当总和生育率 2.4 时，使用统计指标公式转换，得到出生率 20%，若死亡率取 7.5%，得到自然增长率为 12.5%。



当总和生育率由 2.4 转向 0.8 之后，“于田县”就一下变成了自然增长率千分之-0.5，人口转为负增长。

所以无论是从新疆社会的实际发展，还是从人口变化规律和统计指标正确解读，得出结论都是：郑国恩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19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